



# 英语实用文体

## 与翻译研究

刘小蓉 庞茜之 刘 华 编著

ENGLI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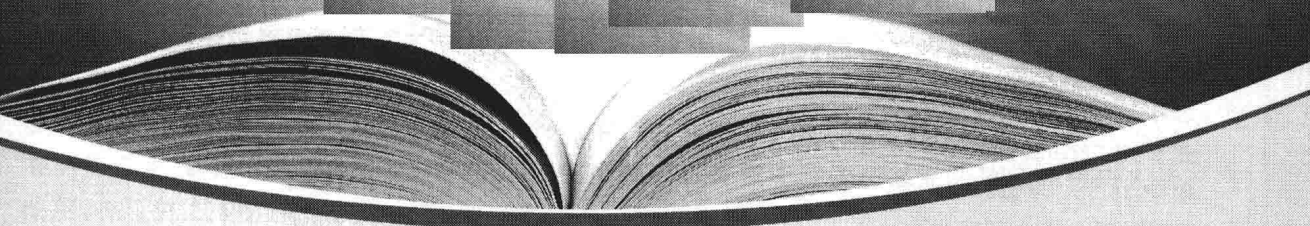


吉林大学出版社



# 英语实用文体 与翻译研究

刘小蓉 庞茜之 刘 华 编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实用文体与翻译研究/刘小蓉,庞茜之,刘华  
编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601-8357-2

I. ①英… II. ①刘… ②庞… ③刘… III. ①英语—  
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5221 号

书 名:英语实用文体与翻译研究

作 者:刘小蓉 庞茜之 刘 华 编著

责任编辑:孟亚黎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6.75 字数:407 千字

ISBN 978-7-5601-8357-2

封面设计:王菊红

北京市登峰印刷厂 印刷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9580026/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mailto:jlup@mail.jlu.edu.cn)

# 前言

翻译是各族人民沟通思想,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强国际交流的必要工具。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和国际贸易越来越频繁,对翻译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05年5月,上海紧缺人才联席会议办公室将合格的翻译工作者列为“长三角紧缺人才”。2006年3月,教育部批准设立了翻译(本科)专业,正式将翻译人才作为专业人才培养。为了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近些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都加强了对在校学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教学,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而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的翻译教学过于依赖长期以来依托文学文体建立起来的翻译理论体系,与社会需求脱节,致使学生毕业后难以马上胜任各实用领域的翻译工作。鉴于此,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和高校课程改革的要求,笔者编写了这部《英语实用文体与翻译研究》,力求改进我国翻译教学的现状,使教学与研究和翻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为了改进翻译教学的现状,本书将重点转移到篇章的分析与研究上,从文体的角度来探讨各类文体的不同特点与翻译方法,将词句的翻译置于篇章总的文体要求统率之下。全书取材广泛,内容新颖,例句丰富,时代气息浓,应用性广。全书分为十章:第一章为中外翻译简史,简要地阐述了翻译在中西方的发展历程;第二章为翻译研究,概述翻译的定义、分类、标准、过程和作用;第三章对目前进行翻译研究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进行了介绍和阐述;第四章开始从实用文体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第五章至十章则分别介绍了文学文体、商务文体、广告文体、旅游文体、科技文体和法律文体这六大门类的文体,论述了这些文体的语言特征、翻译原则以及翻译方法,并在各篇章后面附上了大量的翻译实践练习,从而使学生能综合运用翻译方法和技巧,通过实践和译文对比分析,进一步检验自己的翻译能力和水平。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参考了多方面的文献资料,在此对所用材料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本书举例颇多,对它们的来源无法在每一例子后边详尽列出,但所参考文章和著作均在书后参考文献中列出,如有遗漏,敬请谅解。另外,本书内容丰富,综合性和实用性强,可供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翻译专业等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使用,也可供广大翻译爱好者参考。

本书由成都理工大学刘小蓉、兰州理工大学庞茜之、铜仁广播电视大学刘华编著完成,并有三人共同统稿。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章,第二章,第六章,第八章:刘小蓉;第三章,第五章,第七章:庞茜之;第四章,第九章,第十章:刘华。

囿于笔者的学识和水平,书中的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翻译界同仁和读者不吝指正。

作者

2012年4月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中外翻译简史 .....          | 1   |
|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的分期 .....        | 1   |
| 第二节 西方翻译史的分期 .....        | 23  |
| 第二章 翻译研究 .....            | 35  |
| 第一节 翻译的定义 .....           | 35  |
| 第二节 翻译的分类 .....           | 35  |
| 第三节 翻译的标准 .....           | 37  |
| 第四节 翻译的过程 .....           | 42  |
| 第五节 翻译的作用 .....           | 49  |
| 第三章 女性主义翻译观 .....         | 51  |
| 第一节 女性主义翻译观简述 .....       | 51  |
| 第二节 女性主义翻译观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 | 67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翻译观存在的问题 .....    | 74  |
| 第四章 实用文体与翻译 .....         | 81  |
| 第一节 实用文体分析 .....          | 81  |
| 第二节 实用文体的功能特征 .....       | 88  |
| 第三节 实用文体的翻译原则 .....       | 89  |
| 第五章 文学文体翻译 .....          | 92  |
| 第一节 文学文体的语言特征 .....       | 92  |
| 第二节 文学文体的翻译原则 .....       | 96  |
| 第三节 文学文体的翻译方法 .....       | 97  |
| 第四节 文学文体翻译实践 .....        | 98  |
| 第六章 商务文体翻译 .....          | 125 |
| 第一节 商务文体的语言特征 .....       | 125 |
| 第二节 商务文体的翻译原则 .....       | 133 |
| 第三节 商务文体的翻译方法 .....       | 137 |
| 第四节 商务文体翻译实践 .....        | 148 |
| 第七章 广告文体翻译 .....          | 155 |
| 第一节 广告文体的语言特征 .....       | 155 |
| 第二节 广告文体的翻译原则 .....       | 161 |





|                         |            |
|-------------------------|------------|
| 第三节 广告文体的翻译方法·····      | 164        |
| 第四节 广告文体翻译实践·····       | 170        |
| <b>第八章 旅游文体翻译</b> ····· | <b>177</b> |
| 第一节 旅游文体的语言特征·····      | 177        |
| 第二节 旅游文体的翻译原则·····      | 184        |
| 第三节 旅游文体的翻译方法·····      | 186        |
| 第四节 旅游文体翻译实践·····       | 193        |
| <b>第九章 科技文体翻译</b> ····· | <b>201</b> |
| 第一节 科技文体的语言特征·····      | 201        |
| 第二节 科技文体的翻译原则·····      | 209        |
| 第三节 科技文体的翻译方法·····      | 212        |
| 第四节 科技文体翻译实践·····       | 224        |
| <b>第十章 法律文体翻译</b> ····· | <b>236</b> |
| 第一节 法律文体的语言特征·····      | 236        |
| 第二节 法律文体的翻译原则·····      | 242        |
| 第三节 法律文体的翻译方法·····      | 246        |
| 第四节 法律文体翻译实践·····       | 250        |
| <b>参考文献</b> ·····       | <b>260</b> |

# 第一章 中外翻译简史

##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的分期

从现有史实来看,中国翻译史始于东汉末年安世高的佛经翻译,大体经历了五个高潮。

### 一、佛经翻译

#### (一)佛经翻译的产生和发展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印度。到公元前 3 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徒四处传教。从此,西域地区的一些国家先后开始信奉佛教。《魏书·释老志》记载,西汉武帝“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张骞是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回国的,佛教的传入,大概是在他回国以后的年代里。到了东汉,统治阶级阶层中已有人祭佛,而在公元 65 年之前佛教就流传于中国了。

佛教在中国得以流传,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创立了谶纬神学。而佛教大肆宣扬人生极苦,涅槃最乐,要人厌世,忍辱修行,希冀死后进入“极乐世界”。这种教义,正与谶纬之学不谋而合。所以佛教一经传入,便首先在统治阶级中传播开来,并逐步取得合法地位。佛教徒为宣传其宗教教义,必然要输入印度的佛教经典,于是佛经的翻译活动开始了。

我国的佛经翻译是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达到极盛,北宋已经开始衰微,元以后便是尾声了。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有二:一部分是从西方到中国的僧侣。据统计,从东汉桓帝建和初到南宋元嘉末年(公元 147—453 年)大约三百年间,来中国的西方僧侣就有 60 人之多。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从魏甘露五年到唐天宝十年,约有 105 人,不知名的也有百余人。这些人一般都从事翻译工作,回国的约有四分之一。据最新统计,自后汉末年至北宋末年(2 至 12 世纪)约一千年间,直接参加翻译的有 150 余人。其中有史可让,属于次大陆来华的僧侣学者有 71 人。

自后汉到南北朝所译佛经的原书,以俗语及西域古代文字为多。南北朝所译佛经,其原本有梵本,也有胡本。胡本指转译的西域文本,一是用西域文字音译梵文的本子,二是用西域文字意译梵文的本子。隋以后所译佛经的原本,则统属梵本。



佛经翻译始自东汉,盛于唐朝,衰微于北宋,元以后为尾声。

起始阶段(公元148—315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安世高,译籍30部,41卷,现存22部,26卷;支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

兴盛阶段(公元317—617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释道安,编有《众经目录》,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倾向于直译;鸠摩罗什,共译74部,现存39部,如《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金刚经》等,倾向于意译;真谛,共译64部,现存26部,如《摄大乘论》等;彦琮,共译23部。

全盛阶段(公元618—906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玄奘,通称“三藏法师”,629年前往印度那烂陀寺求学,带回咒文经典657部,十九年中共译经论75部,1335卷,主持了译场,提出“既求真,又需喻俗”和“五不翻”原则。

## (二)佛经翻译四个阶段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 1. 佛经翻译的第一个阶段

#### (1) 第一阶段的特点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这一阶段佛经翻译有以下四个特点。

①翻译佛经的主要力量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而以汉族知识分子信徒为辅助力量。这一时期的翻译是在民间信徒们的资助下分散进行的,尚未得到政府的支持。

②翻译往往全凭口授,即由外僧背诵某经,一人口译成汉语,叫做“传言”或“度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再进行修改。因此,传言者既要精通华、梵两种语言,又要对经典理解透彻。由于译经多凭口授,而翻译又纯属个人活动,这样便不能有选择、有计划地加以介绍。单凭口授译经,无原本可供校对,加上传言者的水平有高有低,译出的经典是否可靠,就值得怀疑了。所以竺法护等要搜求大量梵本回国翻译。

③由于当时处于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译经僧侣对佛教经典抱有虔敬态度,惴惴然唯恐违背经旨。另外,由于经验不足,语言学知识贫乏,不懂得忠实于原文的条件是要合乎译文语言的规范,因此一般都采用直译法。三国时的支谦和康僧会主张译文中减少胡语成分,即减少音译,不死抠原文,注重译作的辞藻文雅,译作在文字质量上得以提高。但却产生了另一个偏向,就是删削较多,文简而不能表原义。于是竺法护再予纠正,译文又偏于“质”。

④佛教是外来的唯心主义神学,大搞唯心主义哲学的中国统治阶级与之一拍即合,是乐于加以利用的。但在接受的同时,又必须加以改造,以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汉代统治者用神仙方术的思想来改造佛教,外来僧侣为了传教也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潮。魏晋之时,谈玄之风非常浓烈。统治阶级使用玄学来改造佛教,而外来或本土的僧侣也多与名士交游。早期译经时介绍佛学的名词、概念,往往从当时流行的道家著作中寻找哲学名词、概念来比附,没有专门的佛学术语。

#### (2) 代表人物:支谦

我国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开始大量进行佛经翻译的,最典型代表为支谦。

支谦,名越,字恭明,支娄迦谶的孙子,月氏后裔,生卒年不详,是三国时期的佛经翻译家。避乱至吴后,因博学多才,被孙权拜为博士。支谦博通经典,并在从孙权到孙亮的三十年间,译





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被认为是继安世高之后的译经大师。他虽不是僧人，但对佛教的发展和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支谦除自己翻译佛经外，还与他人进行合译并开始在译文中加入译注。这种做法得到了我国后来的翻译家的借鉴。

支谦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

支谦指出，在不同的语言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而在“译胡为汉”时，难在“审得其体”，至少“虽不能密”，也应该“粗得大趣”。在文中，他一开始不满意竺将炎“其所言传，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的观点，认为“不雅”。但维祇难强调译经不必讲究“饰”和“严”，只要做到“易晓”和“勿失厥义”就行了，而众人又引用老子和孔子的话来附和赞同，强调译经“实宜径达”。因此，支谦在翻译此经时，也就“因徇本旨，不加文饰”了。

支谦翻译时“因徇本旨，不加文饰”，因此，有人认为支谦尚质不尚文，然而，细读原文时可以发现，与其说是支谦，不如说是维祇难与座中众人主张直译，而支谦是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的，倾向于“文”而不是“质”。

《法句经序》是今存最早的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对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文中支谦第一次提出翻译之不易。其次，它反映了早期“文派”和“质派”的译学观点，证明了我国翻译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质”两派。此外，它说明我国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维祇难等人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不仅有“佛言”，而且有中国古代老子与孔子的言论。这些论述与古代传统文论息息相通，从而使得该序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一篇。

作为我国有资料可考的传统译论中最早的一篇，《法句经序》在我国译论史上是具有开篇意义的。

## 2. 佛经翻译的第二个阶段

十六国时，佛教盛行，其原因是因为统治者的提倡和百姓困苦不堪。加上佛图澄、释道安和鸠摩罗什的积极活动，佛教便有了大量信徒。

佛图澄以法术见长，骗得后赵的石勒、石虎奉之若神明，愚昧之徒也纷纷信仰。但佛图澄对于有识之士则专门传授佛教哲学，培养了不少名僧，释道安就是其中之一。

### (1) 第二阶段的特点

东晋至隋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有如下特点。

①苻坚、姚兴开始组织译场，选拔大批人才参加翻译活动，翻译由私译转入了官译，由个人翻译转入了集体翻译。在当时的条件下，集体讨论能大大提高翻译的质量。传译与讲习相结合。译主不但译经，而且讲经，在以后唐宋译场里一直保持这种做法。这一时期译场很多，但都属于临时性的，到隋代在上林院设置翻译馆，就成为常设机构了。

②这一阶段的翻译原本往往不止一种，这就便于相互校勘，使译文更正确。此时期由于去天竺求经者日多，从陆路或海路纷纷传入梵本，便有条件按梵本翻译，由于梵本数量较多，先译哪种，便有了选择的余地。此外，由于译出的经典不断增加，佛经的目录学也应运而生，如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等。



③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这一阶段也有所发现和进步。三国时支谦不主张在译文中夹杂梵音,并追求文字的典雅,对初期的直译法有所突破,但因追求“巧”而不免失真。赵正和道安有鉴于此,还是坚持直译,务求以忠实为主,不事藻饰。道安在多年整理旧经和参加译事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规律。彦琮总结翻译经验,对译人提出“八备”,比较符合实际。鸠摩罗什懂得梵汉两种语言,提倡意译,主张只要不违原意,就不必拘泥于原文形式。这在南北朝的译经实践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阶段的译员兼通华梵两语者多,加上有不少有修养的人协助工作,译文质量比前一阶段确实有所提高。

④这一阶段的南北两方的统治者都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方都得到发展。佛经翻译为顺应当时的风气,由翻译经部转向较多翻译论部。北方崇尚经学,南方崇尚玄学,译经活动也因此受到限制。

#### (2)代表人物:道安

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人。18岁出家,因其形貌黑丑,初时未受到重视。但由于他博闻强记,数年后,他的师傅改变态度,让他受具足戒,并准许他出外参学。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前秦国君苻坚遣苻丕攻占襄阳,道安被胁迫进入长安,住在五重寺。在长安期间,他除主持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经之外,最重要的是组织和参与了译经,并对不正确的译文加以考证或劝令重译。

道安对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最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他在该序中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思想。

“五失本”的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具体内容如下。

①经文乃外语,其词序相对汉语来说是颠倒的,汉译时改而遵从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序;

②经文原文风格质朴,而汉人喜欢文采,为迎合广大汉语读者,对译文进行修饰,变成有文采的篇章;

③经文原文的论述,往往不厌其烦,尤其是颂文部分,更是反复再三,翻译时被删减;

④经文在长行之后,另有偈颂复述,称为“义说”,类似汉语韵文最后总结的“乱辞”,内容重复,有时是五百字,有时达一千字,在翻译时也被删去;

⑤经文中讲完一件事便告一段落,要转述别的事时,又先重复前面的内容,然后再往下说,这些重复的话也被删除。

“三不易”的意思是有三件事决定了翻译并非易事,具体如下。

①“圣人”本是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法的,现在时代不同了,要改古适今,很不容易;

②“圣人”的智慧本不是凡人所能比得上的,而要把千年前古代圣哲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俗之众,很不容易;

③释迦牟尼死后,他的大弟子阿难等人出经时尚且反复斟酌,兢兢业业,而今过了近千年,却要平凡人以他们现在的理解来传译原文的意思,更谈何容易。

### 3. 佛经翻译的第三个阶段

这一阶段是我国佛教的全盛时期,佛教学派宗派林立。

唐代佛教的发展使译经活动也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顶峰,并主要集中在贞观至贞元这段时期。这一阶段佛教翻译的主要特点是:主译者以本国僧人



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语;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者极少,而往往翻译全集。苻姚时期的译场制度,到这一时期发展更为完备。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四大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有两名(玄奘和不空)出在唐代。

### (1) 第三阶段的特点

这一时期是佛经翻译的鼎盛期,这个时期中玄奘的翻译最引人注目。作为佛经翻译时期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① 译文应尽量做到忠实于原文且通顺流畅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的序言中提出:“然则佛兴西方,法流东国。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义失,语谬则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贵无乖谬矣。”玄奘认为佛经本是在西方盛行的,现在传入中国,在翻译时遇到了语言不同的问题,结果导致翻译后失去了原文的意思。怎样才能翻译好佛经?他说:“传经深旨,务从易晓,苟不违本,斯则为善。文过则艳,质甚则野。”他认为翻译必须做到音不讹、语不谬,才能义不失、理不乖。

#### ② 提出“五不翻”原则

玄奘所谓的“不翻”,就是音译,而音译即不翻之翻。他具体提出了五种情况不翻,即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例如,“般若”一词显得庄重,意译为“智慧”就显得轻浅了;“释迦牟尼”如意译为“能仁”,其地位则似乎不及中国的周公与孔子了;“阿耨菩提”如意译为“正遍知”,则难以与中国道教所言相区别;“菩提萨埵”如意译为“大道心众生”,也显得低劣。凡遇到这类名词,最好都不要进行翻译,采用音译的方法进行处理。

#### ③ “译场”应不断完善

“译场”源于东汉时期,是指许多人共同合作、在严格的分工制度下从事佛经翻译的机构。玄奘主持的译场,比他之前的要严密和健全得多。根据《续高僧传》的记载,玄奘译经可分为下列 11 种分工:

- 译主,为译场主脑,主译人,精通华梵,深谙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
- 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审查译文与原文意义,如有出入,由他与译主商酌;
- 证文,或称证梵本,于译主诵梵文时,注意与原文有无讹误,如有乖离,及时指出;
- 度语,又称书字,根据梵文字音记成汉字;
- 笔受,把录下的梵音按原文句式翻成华言;
- 缀文,整理笔受的记录,使之符合汉语习惯;
- 参译,既校勘原文,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是否有误;
- 刊定,对译文刊削冗长,定取句义;
- 润文,从修辞角度对译文润饰;
- 梵呗,将译文一唱三诵,翻来覆去,直至能朗朗上口为止;
- 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

玄奘译场分工的翻译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科学的,因为它能从不同的层面润色译文,从而保证了文字的纯正与流畅。而且,又把证义、证文放在纯粹的文字功夫之前,首先保证了翻译的准确性。这种译场分工方法对我国现阶段翻译工作的开展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 (2) 代表人物:玄奘

此时期的翻译大家首推玄奘。玄奘(600—664),通称“三藏法师”,姓陈,名神,洛州缑氏(今河南省偃师县)人,世家出身,高僧祖父四代都做过官,“大至将军、国公,小至县令”。由于受到次兄影响,15岁在洛阳出家。他十分勤学,遍访名师,由于感到“所说纷纭,难得定论”,决定去印度求学。公元629年,他离开长安私自出国,历尽艰险,4年后到达北天竺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也是个占有一百多乡镇土地的封建庄园。按寺规,除戒贤法师外,下面应该有十多个精通五十部以上经律论的“三藏法师”,但始终缺一名额。玄奘一到就补上了,于是享受到最高待遇。在那里,他博学广纳,成就远远超过当时一般学者的水平,颇有名气。

玄奘载誉回国所带各种梵文经典657部,于贞元十九年正月回到长安,受到热烈欢迎。他没有接受唐太宗的建议去做官,而是决心献身译经事业。19年间共译经论75部,1335卷,比其他三大译家罗什、真谛、不空所译卷数的总和还多六百余卷,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玄奘所主持的译场,与前一阶段的译场相比,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翻译阵容庞大,职司多至11种: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监护大使。

玄奘精晓梵语,深通佛理,汉文又好,翻译时出口成章,只要记录下来就行了。道宣对玄奘译文的评价:比较起鸠摩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同样,玄奘的翻译较之鸠摩罗什的只存大意可以说是直译,但比较义净那样佶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译。就翻译贵能达意而言,玄奘的译文是成功的。他的翻译最擅长的地方在于学力的深厚,和对于华梵语文的透彻,所以能够自在运用文字来融化原本所说的义理,借以发挥他自己信奉的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就是玄奘能很熟练而巧妙地拿一家之言来贯通原本,甚至改动原本。这在从前没有梵文原典的对照是看不出来的。玄奘对以前的旧译本,凡错误艰涩,不易晓读,或“中间增损,多坠全言”者,都一一予以重译。他还制定了五不翻的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无此故、顺古故、生善故。

印度柏乐天和我国张建木曾对勘过玄奘译的《集论》和《俱舍论》,著文指出玄奘运用了如下几种翻译技巧。

①补充法。为了使读者了解,常常加几个字或一两句话。

②省略法。玄奘的译文删节的地方很少,并且限于不重要的地方。

③变位法。玄奘的译文有时候改变梵文的次序。

④分合法。玄奘在翻译梵文复合词时用此法。

⑤译名假借法。玄奘有时候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这种改译,有时可使含义格外清楚。

⑥代词还原法。玄奘常把原文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名词前加“此”“彼”字等,有时不加。

可见,玄奘的译文质量很高,非常熟练地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其所以能如此,正如柏乐天所说,他“是把原文读熟了、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汉文表达出来”。在翻译实践中,理解是表达的前提,玄奘经常“三更暂眠,五更复起”,坐在灯下圈点第二天要译的经论,可见他在理解上下了很大的工夫。

玄奘的工作态度勤恳又认真。他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工作日程安排很满。他不赞成



节译的偷懒办法。他还注意不同版本的校勘工作。在选择翻译材料方面,他对各派经典兼收并蓄。全部经学分六科,玄奘都有传译。玄奘主持译场时期,还培养了一些翻译人才,在以后的译经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国的佛经翻译,到玄奘可说已登峰造极。他死时,唐高宗曾惋惜地认为是失去了国宝。

公元664年以后的佛经翻译到德宗(780—805)已告一段落。后来武宗灭佛。到宣宗下敕恢复佛教时,佛教元气大伤,再不见往昔的气象了。

玄奘19年的工作,为唐代以后的佛经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那个译场的组织制度,在实叉难陀和义净主持的佛受记寺与荐福寺两个翻译院里基本上承袭下来。660年后,政权归武后掌握了。高宗与武后存在着争夺权力的矛盾。高宗借用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武后则以佛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对于译经问题,武后比高宗更为热心赞助。这时期著名翻译家有义净、不空等。

### (3)代表人物: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344—413),后秦僧人,华名童寿,比道安小30余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祖籍天竺,在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出生。他幼年出家,最初学的是小乘,后来又学习了大乘。鸠摩罗什尤其擅长般若,并精通汉语,曾经在天竺等国游学。在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国君姚兴派人把他接到长安从事译经。鸠摩罗什带领弟子僧肇等八百多人,翻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和《大智度论》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鸠摩罗什对翻译方法及理论深有研究,可惜留存的这方面论述文字极少。从所见零星议论及一些译作来看,他还是比较倾向于意译的。在语言和文风上,鸠摩罗什和他的译经团体一改以往翻译过于朴拙的不足,不仅充分地传达原典的旨意,而且文笔流畅洗练,他的译文甚至被人看成文学名篇。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金刚经》、《维摩诘经》、《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等虽有其他译本,但直到今天流传盛行的还是鸠摩罗什的译本。

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中。此传中记载了他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鸠摩罗什的意思是说:印度文章词句华丽,经中偈颂可吟唱,但改译成汉语后,则失去了美感,虽然保存了大意,但文体却相差很远,就好像把饭嚼烂了喂人,不仅失去原有的味道,甚至让人觉得恶心。对此,他在中国译论史上最早提出了如何保存原文的文体和风格这一重要观点,对翻译文学影响甚大。

## 4. 佛经翻译的第四个阶段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开始大兴佛教,于是佛教又兴盛起来了。到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开始组织译场并翻译印度佛教晚期的经典,于是恢复从唐代元和六年以来已中断的翻译活动。赵匡胤鼓励献经者,对求经者予以资助。太平兴国五年,印僧天息灾和施护同时入京,太宗要他们为译经做准备工作。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寺西侧建造译经院,开始了宋代官译佛经。天息灾在太平兴国八年上书说,历朝译经,多靠梵僧,而天竺离此遥远,如无梵僧,势必使译经工作停顿。为此,请求在京城内选儿童50人学习梵语,好培养出翻译人才来。太宗同意,从500个儿童中挑选出惟净等10人授业。培养出译经事业的后继人才,译经就不完全依靠梵僧了。





宋朝的主译僧人均被授以试光禄鸿胪卿或少卿的官衔,到神宗三年才取消。凡受试卿者改赐“译经三藏大法师”、授少卿者改赐“译经三藏法师”称号。宋初有不少官员参与译经工作。

北宋译经以密教典籍为多,这是由于北宋之初,正是印度密教兴盛之时,因此密教梵本流入不少。宋代统治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违反佛教传统的不纯部分,禁止翻译此类经本,也就限制了翻译活动。

## 二、明末清初科技翻译

### (一)科技翻译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古代翻译主要是与佛教典籍的翻译有关。自从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直到明末清初,即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的万历到乾隆时期,才形成第二次翻译高潮。

科技翻译的兴起与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有着密切的关联,推动这次翻译高潮的还有信教的和不信教但与传教士相识的中国学者。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企图通过大量翻译活动,来扩大其影响,抬高天主教的地位。当时的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西方学术,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虽然从延续时间、译者队伍、译著数量及翻译理论的建树上来看,这次持续了一二百年的翻译高潮都远不及之前的佛经翻译,但这一时期除翻译了一些宗教著作之外,还翻译了许多与宗教相联系却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哲学、伦理学著作,特别是一些与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有关的译著。

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主要是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相结合进行的,汉译17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希腊哲学、科学等。从事或组织翻译的代表人物有:马礼逊、利玛窦、汤若望、林则徐、魏源、李善兰、徐光启、徐寿等,主要译作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四洲志》、《西艺知新》及续编等。

由意大利人罗明坚口授、华人笔录并润色了的《天学圣录》,是传教士在华的第一本译著;徐光启和利玛窦于1607年翻译出版了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编著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梁启超评价该译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天启七年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出版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近代欧洲机械工程学、物理学方面的专著;李之藻与利玛窦等人还合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圜容较义》等书。

另外,在明代我国还设立了最早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即四夷馆,创办了同文馆、京师译学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墨海书馆、益智书会、文会馆、广学会等翻译编译机构。

从明末开始,中华文化通过翻译开始吸收西方科技知识,但到了清朝雍正初期的1724年,朝廷放逐传教士,客观上造成对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翻译的终止。这一时期是我国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以为我所用、强国富民的第一次,客观上推进了清朝的兴盛。

除大量翻译西方科技文献的实践活动外,这一时期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在翻译理论建设方面也做出了许多贡献,例如,徐光启论述了“翻译与超胜”的关系,李之藻提倡翻译西洋历法,杨廷筠呼吁翻译西方书籍,王徵提出翻译资用思想等,这些翻译思想的出现推动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向前发展。





## (二) 代表人物

### 1. 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先世经商,后来家道中落,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1597年中举,到1604年42岁才举进士。先后任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东阁学士、文渊阁学士等职。徐光启是中国明末的爱国科学家和科学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在介绍西洋自然科学和提高中国科学水平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2. 李之藻

李之藻(1565—1630),字我存,又字振之,号凉庵居士,又号凉庵逸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明代著名的天文学家、翻译家。万历二十六年中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少卿、南京工部员外郎等职。他师从传教士利玛窦,认真学习天文、数学、地理、哲学、逻辑学等科学。李之藻20岁时曾绘制《中国十五省地图》,非常精确。后在利玛窦处见到《世界全图》,即翻译刻制《万国地图》屏风。万历三十五年,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浑盖通宪图说》2卷,第二年又译成《圜容较义》1卷,万历四十一年与利玛窦再次合作译出《同文算指》11卷,该书为西方初等数学,涵盖加減乘除以致开方等,并附有很多练习题。该书与《几何原本》一起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编译的重要的西方数学著作,在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天启年间,李之藻与葡萄牙人傅泛际合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著《寰有论》6卷、《名理探》10卷,其中,《名理探》为逻辑学在我国最初的译本。此外他还译有《经天盖》、《简平仪说》、《坤輿万国全图》、《天文初函》等10余部。

李之藻翻译介绍了西方数学、逻辑学、天文学方面的许多著作,为中西思想学术的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之藻没有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但早在1613年他就写了《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一文,这是至今仍然值得重视的涉及翻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李之藻论述了西方学者之所以能在十四个方面超出中国的原因,分析了翻译科技书籍的必要性,提出了应翻译西洋历法、水法、算法、测望、仪象、日轨、万国图志、医理、乐器等科学书籍以供我学习为我所用的主张。

## 三、清末民初的社科、文学翻译

### (一) 清末民初主要翻译特点

清末民初的社科翻译属严复最为著名。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几道。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咸丰三年(1854年)生于福州。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1898—1911年)这13年间潜心翻译,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严复译西学颇多,影响深远,如:《天演论》(T. Henry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Adam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群学肄言》(H. 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群己权界论》(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社会通论》(E. Jenks, *History of Politics*)、《法意》(C. D. S. Montesquieu, *Spirit of Law*)、《穆勒名学》(John Stuart Mill,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W. S. Jevons, *Logic the Primer*)等。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

严复翻译每本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常借西方著名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他的译著推动了新学的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严复译了《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要义,激励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们进行民主革命。他还参照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提出的这一标准,不仅因其简洁凝炼、层次分明、三字中“的”而震动了当时的译界,而且流传至今仍为许多译者喜爱,可见其生命力。总而言之,严复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和翻译理论建设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他代表人物有王韬(1828—1897)、朱执信(1885—1920)、辜鸿铭(1857—1928)、伍光建(1866—1943)等。

文学翻译成就最大的是林纾,林纾(1852—1924),又名林琴南,福建闽县人。林纾不懂外语却能从事翻译,是一位奇才。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之处甚多。林纾译的160多部文学作品,激起过很多中国现代人对外国文学的兴趣。译小说222种,原作者译者159种,名著40余种,如:《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孝女耐儿传》(*The old Curiosity Shop*)、《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 field*)、《贼史》(*Oliver Twist*)、《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吟边燕语》(*Tales from Shakespeare*)、《海外轩渠录》(*Gulliver's Tranel's*)、《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等。其译书方法是别人口述,他做记录。据统计,协助林纾译外国小说的口述者达16人之多。陈家麟口述最多,魏易次之,曾宗巩和王庆通再次,毛文锺也多。

林纾虽然不懂外语,但在与人合作翻译文学作品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林纾认为译书要谨慎,要想翻译出好书,必须先了解书中所引用的古籍和历史典故之类的知识,同时还需要综合各国语言文字的异同,这样才能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

### 2. 译文要忠实于原著

林纾在《黑奴吁天录》的“例言”中说:“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至笃,语多以教为宗。顾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传述,识者谅之。”林纾认为《黑奴吁天录》是由美国作家所写,书中内容有不少语言体现了基督教的宗旨和教义,考虑到译者并不信仰该宗教,所以“特不能不为传述”,即照搬原文内容不进行翻译,希望读者见谅。林纾认为翻译外国作品时有不少内容我们不必赞同,但翻译时还是应忠于原著。

### 3. 译名应统一

林纾在为《中华大字典》写的序言中就译名统一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说:“中国则一字但有一义,非联合之,不能成文。故翻译西文,往往词费,由无一定之名词,故与西文左也。”因此



他提议“由政府设局，制新名词，择其醇雅可与外国名词相通者，加以界说，以惠学者”。这一提议虽没有被当局采纳，但也是他在译学上的另一个贡献。

在这一时期中，翻译小说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周佳空、笛朴等。

## （二）其他代表人物

### 1. 马建忠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镇江)人。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开始攻读西学。光绪二年被派往法国留学。精通英、法、拉丁语，亦谙希腊文，获得博士学位，曾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译员。回国后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因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遂与之分道扬镳。甲午之冬，向清廷呈奏折《拟设翻译书院议》。在奏折中，他建议设翻译书院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同时有计划地译书。他说，“译书一事”乃“当务之急务”。如欲不见欺于外人，必须了解外人的“情伪虚实”。他认为亟须翻译之书有三类，包括各国的时政、外交、行政、生财和自然科学诸科。他还强调翻译书院必须以教、学、译和出书相结合。但此建议未被采纳。

马建忠总结性地指出一般译者的缺陷，他指出：“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不达洋文，亦何怪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针对这种情况，马建忠提出了翻译标准——“善译”：“其平日冥心构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之高下，析其字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析之所以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马建忠写此文时是1896年，比严复出版《天演论》还要早，只是不像严复那样把翻译标准提得更为明确罢了。

### 2.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祖籍广东新会，是我国近代思想家和文学家。梁启超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后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戊戌变法前，作为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就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又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并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

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大力呼吁仿效日本变法，提倡翻译日文书籍，并提出了一套相应的翻译理论。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以日译西书为桥梁，翻译介绍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等，积极进行思想启蒙活动。此外，梁启超对我国的佛经翻译也进行过系统而卓有成效的研究，编写了《佛教之初输入》、《中国佛教史》、《翻译文学与佛典》等，这些书籍对于研究和总结我国的佛经翻译理论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对我国翻译理论史的研究。

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巨著《变法通议》，在第七章的